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第419期 13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8年9月12日

思想 文化周刊

“丝路碑刻”:唤醒崇高的历史记忆

■刘跃进

中国古代向来崇尚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无论哪一种功名,都应有口述、图像,或者文字记述下来,才会更有意义。在简帛、纸张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是金石。金,是指金文,铸在钟鼎上的文字;石,是石刻,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在中国,上自殷商,下至现代,碑刻文字一直是纪念功业的重要载体。西晋名将杜预就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太康元年(280),他率军南下,平定江南,“以功进爵当阳县侯”。他又是著名史学家,自称有“左传癖”,所注《左传》至今流传,是研究《左传》的必读著作。所以,他在立功、立言方面,可谓功垂青史。《南部新书》载,杜预刻石为二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在他看来,无论天地发生怎样的变化,名声可以不朽。

在国外,从古埃及到两河流域,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还有昌盛一时的古印度文化以及神秘的玛雅文化,都留下大量的碑刻,或文字,或图形,说明人类很想通过碑刻去强化历史记忆,幻想永垂不朽。2012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约翰·戴维斯教授和伦敦大学约翰·威尔克斯教授共同主编的《碑文与历史科学》,透过碑文重构人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理解,强调碑文不仅是古代智慧与艺术的结晶,同时也是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与社会生活痕迹的文字折射,具有特殊且珍贵的研究价值。那些碑刻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场景,通过研究者的解读,再次进入世人视野。

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简帛文献与纸本文献共同构成我国历史文献的三大主干。自殷商到清末,我国石刻文献的制作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这些碑刻原生态地承载着每一个特定时代的丰富信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法制、吏治、宗教、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教育、科举、地理、建筑、水利、水文、天文、历法、民族关系、宗室家族、环境保护、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堪称石质载体的百科全书。

从宋代开始,历史学家就利用石刻文献辑佚、校订、补充着纸质文献记载的不足,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今,碑刻文献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显学之一。李慧教授主持编纂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是近年碑刻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推荐。

首先,作者详细梳理了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概况,并就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志的文体、文风及其总体走向进行深入研讨,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传世及新发现的历代石刻文献,汉魏六朝有2000种左右,隋代800余种,唐代石刻文献多达15000种上下。在近年出土墓志中,仅关中地区的弘农杨氏家族墓志就有100多方,长安韦氏家族墓志也有60多方。此外,新出土墓志还涉及到很多文学艺术家,如上官婉儿、李邕、王之涣、严识玄、蔡希寂、赵冬曦、韦应物、窦牟、宋若昭、卢载、元稹、谢观、裴夷直等人的墓志增添了墓主人的新资料;至于由著名文学家撰写的墓志,更为丰富,像吴少微、富嘉谟、崔融、贺知章、卢藏用、李邕、张九龄、崔颢、颜真卿、李华、萧颖士、韦应物、权德舆、裴度、张籍、王建、韩愈、柳宗元、柳公权、元稹、李商隐等人撰写的墓志,有助于人们对这些文学家的创作业绩有新的认识。

在描述这些石刻文献历史价值的同时,作者不忘专业立场,比较注意这些碑刻文献的文学价值,认为先秦的《石鼓文》有刻意模仿雅颂,对汉晋碑铭有一定影响。秦刻石是西周雅颂传统的继承者,这与西秦地处西周旧地、受其熏染较重有关。汉碑行文组织严密,注重精心描绘,语言风格明显受到汉代辞赋和散文的影响,繁富缛丽而又多凝练。从碑刻文字的写手来说,能够将辞赋风格较完美地运用于碑文撰写者,首推蔡邕,实开一代风气。对此,我曾撰写论文多所论列(参见《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不赘述。自汉讫晋,虽然时有禁碑之令,但撰作碑志的文人,不绝如缕。甚至,皇帝本人也参与到石刻文字的写作中,事实上消解了碑禁的强制性。晋宋以降,文人撰作碑志蔚然成风,推动了传统碑志文创作的繁荣,使碑志文呈现出趋近彼时美文的发展状态。作为东晋撰碑大家,孙绰根植于深厚的家学传统,广泛继承蔡邕碑刻写作的范式,并加以敷演,扩大碑文容量。在语言使用上,他善于熔铸经典,臻于雅驯,为南北朝碑文的发展开创了一片天地,也为后来碑文写作者提供了有益的成功经验。可以说,孙绰是继蔡邕之后对碑刻文字写作颇具推动作用的一代名家。

南朝碑志偏重纪德,北朝碑志以叙述事功为主,更接近于碑志文体的应用功能。职此之故,北朝碑志往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质实简练,与南方的绮丽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温子升、邢邵、魏收为代表的“北地三才”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南北碑志风尚相埒格局的形成。随着庾信的北上,南北碑志的风格日渐融合。与此前诸多碑志埋扩后便无所觅其踪迹的情况不同,庾信撰写的碑志文能集众家之长,有意识地在审美追求方面,凸显个性,后世广为流布,并最终完成了始于孙绰的碑志文定型化进程。

隋代碑志文的风格有融合南北的倾向,事实上充当了从南北朝到唐代碑刻文字发展的桥梁作用。唐朝兴盛之初,出现了张说、苏颋等处在转型时期的碑志文高手,他们上承庾信骈体为主的碑志文风格,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对碑志文进行变革。降及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以古文相号召,变骈为散,改变了碑志文的发展方向,使得本为应用文的碑志文名正言顺地进入文学苑囿。

这些描述,援据精博,要言不烦,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其次,作者充分利用新出土碑刻文献,对相关文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提出新见解,补充新材料。

对待古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陈寅恪先生倡导一种“了解之同情”的读书态度,通过这样的阅读,更便捷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处世原则,更清晰地辨析他们的创作动机,更多元地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譬如关于韦应物的研究,文学史大都是把他放在社会或家族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这固然不错,但依然缺少叫人感动的细节。韦氏家族墓志的出土,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把握韦氏不同人生阶段的创作情感及其作品所蕴含的深邃内容。由墓志可以推知,韦应物的生活与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从妻子元藾去世后,他的生活一直笼罩在浓郁的悲剧色彩中,创作上也相应进入新的阶段。国难家悲,是造成韦应物前后诗风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

再如张九龄,他受张说知遇之恩,特撰《张说墓志》,叙述生平,饱含深情,娓娓道来的叙述,给人从容不迫之感,其所表达的敬仰之情和永诀之痛,自在不言之中。张九龄特别推崇张说在“风雅陵夷”数百年之际,专事“懿文”以“激仰后来”的贡献,持论公允,有理有据。他本人就是“后来”者之一,继张说之后,执文坛牛耳,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从根本上扭转了六朝以来的柔靡之风,为唐代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李商隐不仅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方面亦有很深造诣。他所撰写的《王翊元夫妇墓志铭》是目前仅见的书法真迹,也是其存世不多的以古文写就的墓志,不用典、不征事,直截了当,情事分明,简洁明快,如风行水上。由此可以看到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其后文坛的影响,又能体现晚唐的文章风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这些论述,基于新的碑刻文献,多所发明,多所发现,对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

再次,在充分占有资料、深入细致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丝路碑刻”概念,举凡“在地域上属丝绸之路境域而碑文内容与丝路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外交、民族、宗教等相关的碑刻”,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这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丝路碑刻融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于一体,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更是道器的统一,呈现出一种崇高与阔大的气象。

就“器”的形态而言,《张骞题碑》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见证界碑,《曹全碑》是丝绸之路上的书法艺术神碑,《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是丝绸之路上的纪录战功大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巨碑,《唐蕃会盟碑》是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融合丰碑……这些碑刻,形制威严,厚重高大,有一种雄浑阔大的震撼力量,充分体现出古人“观物取象”的思维特点,让观者在崇敬中“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语言上说,《曹全碑》是闻名海内外的“三绝碑”,不仅书法是汉隶旗帜,碑文的语言也简洁有力,形象传神。号称“燕许大手笔”的文学家张说撰写的《监牧颂德碑》《郭知运碑》《杨执一碑》等,苏颋撰写的《唐璿碑》等,语言俊丽精密,典正文雅,文质并行,蕴含着庄严伟大、慷慨激昂的气度,体现出“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文学观念。

再就“道”的层面而言,丝路碑刻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无不指向崇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崇高往往与“大”相互关联。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汉唐丝路碑刻也以大为美,展示墓主的精神气质和不世之功。“张骞凿空”,无论从战事、外交,还是从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看,都是功垂千古的重大历史事件。清人徐松撰《西域水道记》等文献,都记载了他们所见到的《张骞题碑》,凡24字:“去青冥而七(一作尺)五,远华西以八千,南通火藏,北接大宛。汉张骞题。”这方碑,系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所刻,矗立在大宛边界的高山上。我们知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一年之久,经过千辛万苦,他才得以逃脱,却没有退回长安,而是继续前行,就是为了完成汉武帝交付的使命。这种选择,展现出炎黄子孙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美。此外,《霍去病墓石刻题字》《敦煌长史武斑碑》《豆卢恩碑》《李勣碑》《冯师训碑》《李晟碑》《张公德政碑》《姜行本记功碑》《郭知运碑》《王忠嗣碑》等,无不凸显这种崇高美。

所谓碑者,悲也,抒发悲伤的情怀自是题中之义,但丝路碑刻有所不同。《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特别指出,丝绸之路上的碑刻文字,在记述这些历史人物功业的同时,更是传递一种精神,一种信念。读者透过这些碑文,唤醒了崇高的历史记忆,读出了奋进的精神力量。这,或许就是丝路碑刻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值得发扬光大。

风雨海岱山

■应 奇

“你到底是怎么来到海德堡的?”——2000年,时已77岁高龄的小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的作者维尔纳·桑巴特的公子)在追忆他孟浪的青春岁月时,曾有如此一问。要是顶真说起来,这貌似也并没有错,任何初次来到海德堡的人似乎都该有此一问。

犹记去年十二月初,我和几位同事一起从上海出发,到卑尔根大学参加一个会议,结束在湾城的议程后,我们一行人分成了三拨,其中两拨分赴巴黎和里昂继续参加“高大上”的学术活动,而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同事分手后,就只身转上了飞往柏林的班机。飞机降落在泰格尔机场时已近午夜,其时在柏林访问的、我过去的学生L君准时地守候在出口处。“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而我出一趟国要“搬”的书也不少——其实大部分书还是八月份在挪威买了而当时未及带回的。师徒俩于是提拖着大包小包,要穿越整个柏林城,到L君在洪堡大学新校区附近为我预定的旅舍去。因为我在德停留的时间前后不过三天,L君打从他老师下飞机开始就做起了“导游”,真可谓“分秒必争”。这样一路折腾到旅馆已是凌晨,而我们次日(其实已是当天)一早就要到海德堡去,于是就顾不上再进一步欣赏柏林的夜色而在异乡的旅舍中沉沉睡去了。

就这样只歇了三四个小时,师徒俩就在天还没有完全亮之前出门往海德堡进发了。按照L君之前的攻略,从柏林坐火车到海德堡要在曼海姆中转。但是列车刚到法兰克福,天就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一路向西南,雪却是越下越大。从微信“直播”中掌握我们行踪的国内朋友好心地“预警”:“今夜海德堡大雪!”看着这样的预报,望着窗外的大雪,L君开始忧心忡忡起来——是的,他的“如意算盘”中还要利用当天下午的时间在海德堡逛逛景点的,而他的老师这时却是一派唯恐天下不乱的“气象”。果然,离曼海姆还有相当的途程,我们坐的这趟车就宣布停运,也许是对于德铁之“效率”已经习以为常,所有旅客“不吵不闹”,都默默地下车去风雪中等待下一趟不“停运”的列车。可是经过这番折腾,我们到曼海姆就已时近傍晚了,再转上往海德堡的短途车,到目的地下来时,早是华灯初上时分。L君事先联系好的朋友——华中科大哲学系的S君在火车站等我们。S君来海德堡已数月,他熟练地把我们带到一家中餐馆,先解决“食为天”问题,然后就“心领神会”地把我们带到了海德堡老街上那家著名的旧书店。可惜的是书店即将打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L君“灵机一动”,就把他老师给推了出去:“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的政治哲学教授,我们慕名来到你们书店……”,可是朋友,这里是海德堡,又有谁会知道这个“著名的”中国教授?——再说按照德国人的严谨规则癖,在L君开腔之前,我就知道他是在做多余的表情,或者说只是表达自己的某种心情罢了!

既如此,到此一游的我们就只好把预想中逛书店的行程调整和压缩到次日下午返回柏林之前,而此前要游览的景点,当然就是传说中的哲学家小径(Philosophenweg)以及“海德”这个“堡”(我用这个表述来指代海德堡城堡)了。第二天一早,S君就来向导我们坐上该城有名的有线轻轨,穿过海德堡大学新校区径直来到了哲学家小径的入口处。当真实地站到这个小径上时,号称以哲学为业的我内心不免还是有些感触,这就正如头天晚上我们与S君聊天时,我“运用”弗雷格的“概念与对象”之“区分”,试图把捉我们这些大半辈子学习哲学而又是初到德意志的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感受:一方面,我们通过书本摹状到的海德堡、图宾根、弗莱堡和耶拿这些“概念”当然是与我们实际遭遇时感知到的“对象”“不同”的;另一方面,当我们真正来到这些地方时,我们所“惊讶”的恰恰又不是这种“不同”,而是它们竟然就是海德堡、图宾根、弗莱堡和耶拿!事实上,阐明概念与对象之“相异相即”即使不说是德国观念论之最高成就,那也是其基本成就。亦可谓老天弄人也厚人,这天的海德堡并没有积雪,而是一早就下起了冬雨,雨之大,使得雨伞都基本上失去了作用,而风之大,竟然摧折了我从湾城带回的那把雨伞(这是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赠送与会代表的礼物)!在这样的天候中,登上哲学家小径所在那座小山的山顶,遥望内卡河老桥和对面的海德堡和“海德”“堡”,我竟有些无来由地想起了阿伦特在“海德格尔八十岁了”中的那个“名句”:“如同柏拉图的著作在千年之后仍向我们劲吹不息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掀起的风暴也并非起因于某个世纪,它来自远古,臻于完成,此一完成如同所有的完成一样,又归于远古。”

“经历”这种“风暴”的“洗礼”,满是断垣残壁的“海德”“堡”之于我的“冲击”也似乎要“缓和”得多了,从远古,从荷尔德林,从“二战”,川流不息至今的内卡河仍然是“动态”的,而“静穆”地见证了这一切的“海德”“堡”则已经成为“文物”,只有像已故的叶秀山先生这样的“哲人”方才能有这样一番“哲思”:“所谓‘文物’的‘时间性’,尚不仅在于日月风霜之磨洗‘痕迹’,还在于作为‘文化’和‘人文’之‘物’所要向我们‘说’的那些‘话’,即所要向我们‘显示’的历史性的‘意义’……‘文物’之‘意义’本不‘在’(占)‘空间’,而‘在’‘时间’,故‘文物’作为‘实物’所‘占’‘空间’亦不能‘割断’它作为‘文化’‘人文’之‘物’的‘时间’,这也可谓一种‘物’(笔)断意不断。”凭藉这样的“思之力”,经过这一番“思史诗”的“遨游”,叶先生继而得出:“从哲学的观点看,不仅不该把‘文献’‘还原’为‘文物’,而且只有把‘文物’当作‘文献’看,‘文物’才成其为‘文物’。”正是“秉承”叶先生的教导,参观完“海德”“堡”,我们就马上进入了大学城附近最大的一家旧书店,此亦可谓“指示性地”“践履”了从“文物”到“文献”之“进路”!

还是在S君的导引下,我们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就光顾了海德堡的三家书店。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头天晚上吃了闭门羹的那家据说是海德堡最大的旧书店。在大学图书馆附近也有一家旧书店。据我极稀少的经验,这两家书店的对比有点儿像哈佛广场附近那家我所谓“罗尔斯书店”之与不远处的那家“乌鸦书店”,一者是书龄的差异,前一家书店是真正的旧书店,后一家其实是二手或折扣书店;二是书品上的差别,前一家书店的主题似乎也要老旧些,后一家则要“前沿”些。虽则这种对比当然不是绝对的,例如我在前一家书店得到的最有印象的一本书乃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精装初版本,可惜是第二次印刷本,有趣的是,那家书店里还有不少英文的语言分析哲学著作,当然都至少是九十年代之前的;而在后一家书店,已经有中文译本的施温尼德的《自律的发明》让我稍有惊喜感,书架上还有不少休谟和康德的讨论集,我也选购了若干种,记得有阿伦·伍德所撰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导读,也有他编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讨论集。说来惭愧的是,由于我不谙德文,德文书对我就只有纪念性的意义了,我于是选择了两份费希特论文的抽印本,年头都是在百年以上的,另有一册雅斯贝尔斯的讨论集,里面的论文有德文的,也有英文的,应该是一个会议论文集。这种在非英文为主的书海中翻找英文书的感受自然让我联想起不久前在挪威的访书经历。也还记得在湾城一起逛书店时,童世骏教授对卑尔根大学书店的一位兼职店员聊天说,一家大学的品位如何,一个颇为有效的观察指标是要看它有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从这一指标来看,童教授的母校卑尔根大学无疑要属于优异甚至卓越之列,而眼前的海德堡大学似乎也不错,虽然这并不只是因为我在海德堡所到的这第三家书店中得到了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维》的续集,这个英译本还是2017年刚刚出版的!以至于当同行湾城的郁振华教授从微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要我把此书的目录微拍给他。我也想起余杭韩公当时就笑话我居然到了海德堡而不去参谒韦伯墓,我知道,如果我说得到老哈的这个集子或可稍补这项“遗憾”,韩公是一定不能“同意”甚至会要“动气”的,但是无论在现实的制约下还是在规范的空间中,我所能设想到的大概就只有这个“还击”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还是要特别感谢陪我逛书店的S和L两君,记得在第一家旧书店,由于时间紧迫,我“情急”之下要求他俩登上梯子把估摸着我会有些兴趣的那些书先找出来供我拣选,而等我们到了第二家旧书店,无待我说,S君就开始主动地帮我找书了,印象中《自律的发明》似乎就是他找出递到我手里的——诸位,面对此情此景,如果我说这世上旧书好找,如此书友却是难得,你们一定不会反对吧?!

带着几乎满载而归的“战利品”和几乎同样满载而归的“意犹未尽”,坐在从海德堡返回柏林的火车上,我不禁想起刚开始规划这短暂的德意志之行时,L君问我:就这点儿时间,老师打算到哪里走走?我茫然地在空白的脑袋中搜索了一番,在一片同样茫然的空白下,忽然就嘣出了“海德堡”三个字。还记得头天刚见到S君时,他用“浪漫”来形容我在如此短促的行程中选择到海德堡之举,其实我对以海德堡为渊薮的德国浪漫主义所知甚少,如果仔细追溯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来到海德堡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还是在于我父亲早年留给我的那册中译初版《小逻辑》,那是他在北京求学时在东安市场买到的,记忆里我在初中时就“得到”了这本书,我并非那种“早慧”少年,那“天书”般的内容自然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只有那书序言落款处的“海岱山”三字却莫名给我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象。如果我说这三个字最初给我的意象有点儿像是《基督山伯爵》中那座神秘的岛屿,那也许既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降格”,但是的确,那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气息一直当我知道海岱山就是海德堡之后也并未消失殆尽。以我之不才,如果非要说自己当初是被这个有些神秘难解的地名引上哲学之路,那必定有“自我拔高”之“嫌疑”,就正如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海岱山”这个译名乃是贺麟先生之首创,而据说它其实出之于德语文学的前辈学者杨业治先生,但是不管真相如何,且让我“借花献佛”,摘出杨译荷尔德林《海岱山》中的诗行以献给那个“旧梦”:

像被神所遣使,一种魔力把我
在桥上紧箍住,那时我正经过,
远方迷人的景色
对我照射到山里来。